

# 职业教育、比较优势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王 佳

(国家开放大学, 北京 100039)

**[摘 要]** 职业教育对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挖掘职业教育的比较优势, 对职业教育和数字经济发展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职业教育具有就业优势、机会成本优势、专业调整动态优势以及立德树人、思政教育的优势。基于职业教育的比较优势, 职业教育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拉动数字经济增长, 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职业教育的规模和层次产生影响。在定量研究方面, 2020年, 高职院校数量与省(市)的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成正比。现阶段, 应该进一步扩大高职院校学生的规模,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为缩小贫富差距, 提高就业质量,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强有力的教育支撑。

**[关键词]** 职业教育; 比较优势; 数字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286 (2022) 02-0005-08

职业教育是指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 对于提高一国劳动者的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办好继续教育, 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 大力提高国民素质, 为我国新时代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明确了任务。2021年, 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关系着国民教育体系的完善, 也是提高全民综合素质、经济稳步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

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的基础理论之一, 由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是指: 不同国家生产不同产品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即劳动成本的差异, 各个国家应专门生产其劳动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 进口劳动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 就能获得比较利益。一些学者将“比较优势”理论拓展至高等教育研究中。孙涛(2020)研究发现, 相较于其他扶贫方式, 高等教育在提高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 实现扶贫脱贫方面, 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sup>[1]</sup>岑晓潼(2019)认为可以从完善留学生就业机制、明确招生对象及定位、发展广西留学教育特色入手, 充分发挥东盟来桂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比较优势。<sup>[2]</sup>李兴洲、赵陶然(2019)发现职业教育对促进精准扶贫、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有

收稿日期: 2022-05-15

基金项目: 2020年度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课题“职业教育、比较优势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2020A0083); 国家开放大学2018年度重点课题“国家开放大学金融类专业设置优化研究”(G18A0003Z)

作者简介: 王佳(1985—), 女, 河南省人, 国家开放大学经济管理教学部金融学院副院长、讲师, 研究方向: 国际金融、经常账户、职业教育。

比较优势。<sup>[3]</sup>姚永强、何丽芬(2019)认为地方高校应依托自身的资源优势,培育特色学科,找准办学定位和实施差别化发展策略,在“双一流”建设中有所作为。<sup>[4]</sup>近年来,学者们还逐渐将比较优势理论拓展至职业教育研究中,分析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区域教育特色、教学改革以及高校学科建设等方面的优势和发展趋势。

在教育经济学研究中,学者们重点关注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教育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张优智、张珍珍,2020;孟望生、徐进,2020;祝树金等,2008;叶茂林、郑晓齐等,2003)。<sup>[5-8]</sup>但是,鲜有研究聚焦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教育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首先结合国家开放大学在浙江地区两所高职院校的调研情况,剖析职业教育的比较优势。其次,定性分析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再次,利用2020年横截面数据,量化研究高职院校数量与中国省(市)数字经济规模的关系。最后,为推进职业教育发展,释放内需活力,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提出建议。

## 一、职业教育的比较优势

### (一) 职业教育的就业优势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对于人才需求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大幅度上升。目前,我国的就业市场存在着供需不匹配的问题:从供给角度出发,普通高校的大学生就业难,就业率呈现下降趋势。对于高中生、初中生等低学历人群而言,他们的就业更加困难。从需求角度出发,企业难以找到合适的技术性人才,传统的普通高等教育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与普通高校相比较,职业教育在就业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根据教育部统计数据,近十年来,中职毕业生就业率连续10年保持在95%以上,高职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超过90%。职业院校的就业率远高于一些普通高校的就业率。事实

上,根据2021年6月,国家开放大学金融学院在浙江地区高职院校的调研,很多职业院校,例如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都是订单式就业,在毕业前一年就已经与企业签约,呈现出供不应求的就业趋势。

2021年3月,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对新版专业目录的解释中说明:这些专业不仅符合产业人才需求,就业面向明确,也是“面向十四五”时期重点布局的数字经济新产业。随着职业教育覆盖面的增加,职业教育与行业会呈现更加密切的联系,职业教育的就业优势会体现得更加明显。

### (二) 职业教育的机会成本优势

与普通高校相比较,职业教育的学习年限较短,学生可以较早的步入社会,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按照18岁入大学为时间起点,普通高校学生大学毕业的时间大约是22岁,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时间是25岁,博士研究生的毕业时间是30岁左右。而职业教育的年限一般是3—5年。初等职业教育的招收对象是小学毕业生或者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员,是义务教育的组成部分,学生毕业年龄大约是16岁。中等职业教育是高中阶段教育的一部分,毕业生年龄大约是18岁左右。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高层次教育,高中毕业生入学后的学习年限为2到3年,初中毕业生入学高职院校后的学习年限为5年左右。高职毕业生的年龄大约在20岁左右。从年龄分布来看,职业院校学生能够节省更多的教育时间,输出劳动力,作为人力资本投入到一国的经济增长进程中。

此外,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男性为60岁,女性为55岁。从工作年限视角出发,高职院校的学生工作年限在40年左右。如果普通高校的毕业生继续深造,博士毕业后的年龄一般都是30岁以上,工作年限为25—30年。所以职业院校的学生有充裕的时间,在工作中提高自己的技能,得到锻炼和成长,进而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 (三) 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动态调整优势

与普通高校的学科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在专

业建设的动态调整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普通初中和高中教育主要是以升学为目的,以基础科学知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大学本科的学科体系以基础学科教育为主,厚基础、宽口径是现阶段高校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导向。以经济学为例,宏微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等课程都是经济金融类的必修课程,在课程体系中占据了大部分的学分和学时。课程调整的速度往往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社会越来越需要数字经济的复合型人才。职业教育在对接当今社会发展的流行产物方面,例如电商直播等,往往更具有针对性。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在浙江地区的走访调研,可以发现,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和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等多所高职院校都开设了电商直播的课程,紧跟数字经济发展和时代潮流,培训学生掌握直播带货的专业技能。

从宏观视角出发,职业教育和社会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必要引导职业院校建立完善的专业设置动态更新机制,从而更好地适应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促进数字化与工业、农业、服务业等行业的深度融合。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要根据数字经济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及其结构,设置相应的专业,提升劳动力的专业技能,适应传统专业和数字化交叉融合的新发展。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启动了1+X证书制度试点,已有超过4500所职业院校参与试点,超过320万职业院校学生参与试点。未来,确保职业教育与新科技、新业态和数字经济市场需求对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根据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和调整课程体系,是发挥职业教育专业动态调整比较优势的重要途径。

#### (四)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和思政教育的比较优势

职业教育在思政教育方面也具有比较优势。根据国家开放大学在浙江地区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和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调研,发现高职院校的思政教育各具特色,“润物细无声”地把思政教育融入教学实践,是职业院校的思政教育的显著特点。

典型案例有,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将“爱国爱乡”“捐资助学”融入学生课堂中。在教育教学中,结合四史,引入课程教学实践环节。具体做法有,在企业经营管理课程中,将抗日战争做成课程章节的沙盘,为课程思政增加更多的元素。根据授课教师反馈,融入思政元素的企业经营管理课程,内容丰富,实践性强。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思想政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创新思政教学方式,扎实推进“三全育人”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思政教学的重要任务。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授课教师在课程教学实践设计中,也实现了思政元素的有机引入。例如,在市场营销课程中,引导学生树立直播带货带上责任的职业操守,避免直播翻车。鼓励学生通过直播带货,传播中国文化,推广国产品牌,推广大数据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和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与普通高校相比较,职业院校的思政教育以实践教学为载体,深化思政教育的改革创新,有效落实职业院校思政教学的生动性、实效性。

## 二、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 (一) 数字经济发展

李艺铭、安晖(2017)指出数字经济的核心概念包括信息经济、信息技术经济学、互联网经济、网络经济、赛博经济等。这些概念是不同时期和不同学科背景下的产物。<sup>[9]</sup>数字经济发展是一个以数字经济规模增长为特征,泛指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经济、社会变革等各方面综合演进的过程。数字经济发展包括以下特征:数据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技术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信息产业的基础性先导作用突出;产业融合成为新引擎;平台化以及线上线下一体化。由于各国的经济基础、人口数量、科技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国家(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规模远高于西部地区。张腾、蒋伏心(2022)认为数字经济显著地

促进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能够显著驱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高。<sup>[10]</sup>

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数字资源开发能力、核心技术和设备、自然环境、生产要素禀赋、相关制度、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等。人文环境、政府关怀也是影响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 （二）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 1. 第三产业和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决定职业教育的规模和层次

一国经济的类型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定位。历史上，各国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并不相同。以高职教育为例，劳动密集型产业丰富的国家，往往将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于高技能、高素质人才培养。当一国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后，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会向初级、中级研发人员转变。20世纪80年代后，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迁出国内，基本完成经济结构转型。这些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为培养经济发展需要的初级研发技术人员，

在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和目标上高于我国高职院校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人才培养定位。

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时期，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主要体现在第三产业在加速发展。图1显示了1978年以来三大产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第三产业服务业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中国经济增长的进程中，一部分制鞋、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由东部向西部转移，一部分通信、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国外转移。经济结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决定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在现阶段时间内仍应以高技能、高素质人才为主。现阶段，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白雪洁、宋培、李琳（2022）认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推动了产业结构服务化、工业结构高级化和服务业结构高级化。<sup>[11]</sup>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职业教育也面临着数字化转型。张青山（2022）认为随着“互联网+教育”的不断发展，职业教育进入了数字化阶段，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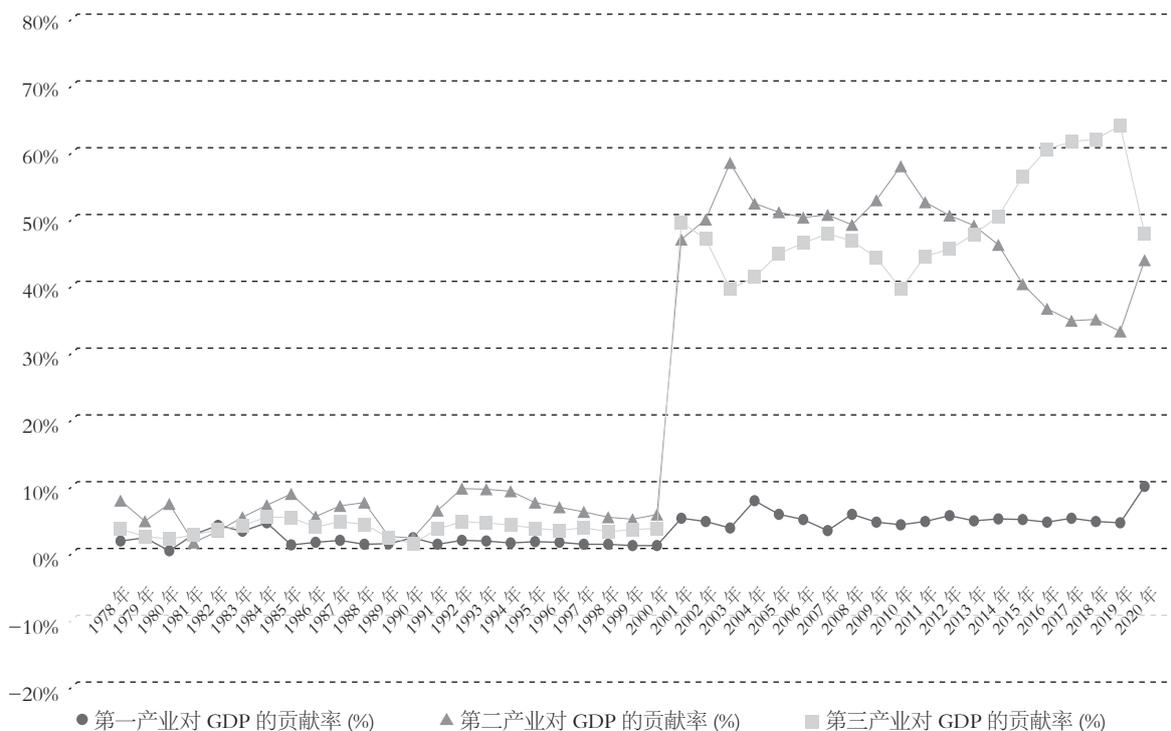


图1 1978—2020年三大产业对GDP增长的拉动（百分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需要说明的是,未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的进程中,中国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可能会有所调整,初级研发和学术研究可能是未来中国高职教育的另一项目标方向。此外,职业院校要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依照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设计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向。

## 2. 职业教育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软环境是指经济增长的进程中的社会人文环境,例如诚实守信、爱岗敬业、传统文化传承等。经济软环境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也是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信用危机是威胁经济增长,发生经济危机的主要影响因素。规范社会的经济秩序,树立诚信意识,既需要执法部门的监管,也需要社会文化氛围的引导。

职业教育对于引导居民形成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前沿的科学技术和专业知识具有促进作用。徐铭、丁钢(2012)认为高职院校的文化遗产是继承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过程。<sup>[13]</sup>白滨、和震和吴秋晨(2021)构建了高技能人才的职业核心素养的洋葱模型,选择了包括职业道德、责任心等十一项要素,探讨职业教育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责任。<sup>[14]</sup>马吉宏(2019)认为高职院校的基本功能是文化传承,高职院校的教师和学生是实现文化传承的主体。<sup>[15]</sup>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教发〔2014〕6号)中指出“职业院校的大学生是我国民族工艺和民族文化的传承者,培养民间艺人、技艺大师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职业教育义不容辞的责任”。

职业院校为传承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特色提供支持,并且呈现出自己的特色。例如,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将学习民族文化,发扬和传承民族文化融入学校的教学和产业中;广西柳州第二职业技术学校依托广西民族服饰文化传承的职教基地优势,推广少数民族特色服饰课程,推广和传播少数民族文化;黑龙江民族职业学院针对少数民族学生热爱民族文化和技艺的特点,培养具有专业

知识和设计技术的民族技艺人才。职业院校对民族文化遗产,提高区域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

## 3. 职业教育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并不以营利为目的。职业教育培育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也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郭璇瑄、陶红(2022)认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职业教育需要适应数字经济新变化,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增值赋能,提质培优,助力我国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sup>[16]</sup>刘琛(2020)认为数字经济背景下,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以助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激发社会活力和提升营商环境国际竞争力。<sup>[17]</sup>事实上,经济学生产理论(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指出,劳动和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职业教育可以通过影响国家(地区)的劳动资本,对数字经济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既需要大规模的数字人才,也需要专业化和高端技术结合的复合型人才。职业教育需要紧紧跟随时代变迁的新技术和市场需求的新方向,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课程的前沿性、教育资源的丰富性、灵活性等特点,进一步贴合数字经济企业的人才需求,助力数字产业经济提速升级。

综合来说,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职业教育的规模和层次,职业教育决定了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环境,职业教育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新的消费点以及扩大基础设施建设等途径提高数字经济增长率。高等职业教育可以直接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技术业务能力,进而提升区域数字经济的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率,优化区域经济结构。职业教育是提升全民素质,拉动经济稳步增长,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

## 三、职业教育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定量研究

本节考察高职院校数量和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

定量关系。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考察高职院校数量和区域数字经济指数的关系。本文以东部、西部和中部三个区域为样本,研究高职院校数量和数字经济指数的关系,并且利用2020年中国省(市)和自治区的高职院校数量、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数据,验证高职院校数量对数字经济的拉动作用。

### (一) 高职院校数量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截面数据

表1显示了,2020年,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的高职院校数量和各个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其中GN代表高职院校数量, index代表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可以发现,

2020年,中国东部地区的高职院校有495所,中部地区的高职院校有381所,西部地区的高职院校有339所,东北部地区高职院校有114所。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总和为423,中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总和为175.8,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总和为258.1,东北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为61.4。

### (二) 高职院校数量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截面数据分析

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高职院校数量最多,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也高于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的职业院校总数最少,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也最低。2020年,数

表1 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职业院校数量和数字发展指数<sup>①</sup>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部		
省份/城市	GN	index									
北京	26	55	山西	48	21.1	内蒙古	35	18.9	辽宁	51	23.5
天津	26	24.9	安徽	74	29.3	广西	37	26.2	吉林	21	17.4
河北	61	29.4	江西	53	28.5	重庆	38	28.8	黑龙江	42	20.5
上海	31	45.5	河南	77	35	四川	57	35.6			
江苏	83	52.2	湖北	56	32.5	贵州	29	24.7			
浙江	47	51.5	湖南	73	29.4	云南	37	21.3			
福建	55	38.6				西藏	3	8.0			
山东	76	42.8				陕西	37	26.3			
广东	79	65.3				甘肃	22	19.3			
海南	11	17.8				青海	8	13.8			
						宁夏	10	17.1			
						新疆	26	18.1			
共计	495	423		381	175.8		339	258.1		114	61.4

数据来源: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学校库. <http://www.cvae.com.cn/srdm/vocationalCollege/research.jspx>; 《2020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DEDI)》. <http://www.mtx.cn/#/report?id=6842662020>.

<sup>①</sup>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0省(市);中部地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6省;西部地区: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12省(区、市);东北地区:辽宁、吉林和黑龙江3省。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中国澳门地区的数据缺失。

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前五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北京、江苏和浙江、上海。这些省份也是高职院校数量最多的省份。2020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排名后五名的省份分别是吉林、海南、宁夏、青海和西藏。这些省份也是高职院校数量较少的省份。图2显示了2020年31个省（市）的高职院校数量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散点图，添加趋势线，

可以发现，高职院校数量与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曲线斜率为正，随着高职院校数量的增加，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也呈现上升趋势。曲线的斜率为正， $R^2$  为38.4%，这说明各个省（市）高职院校数量和其数字经济发展规模之间正相关，并且具有较强的相关性。量与省（市）级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指数表现一定出正向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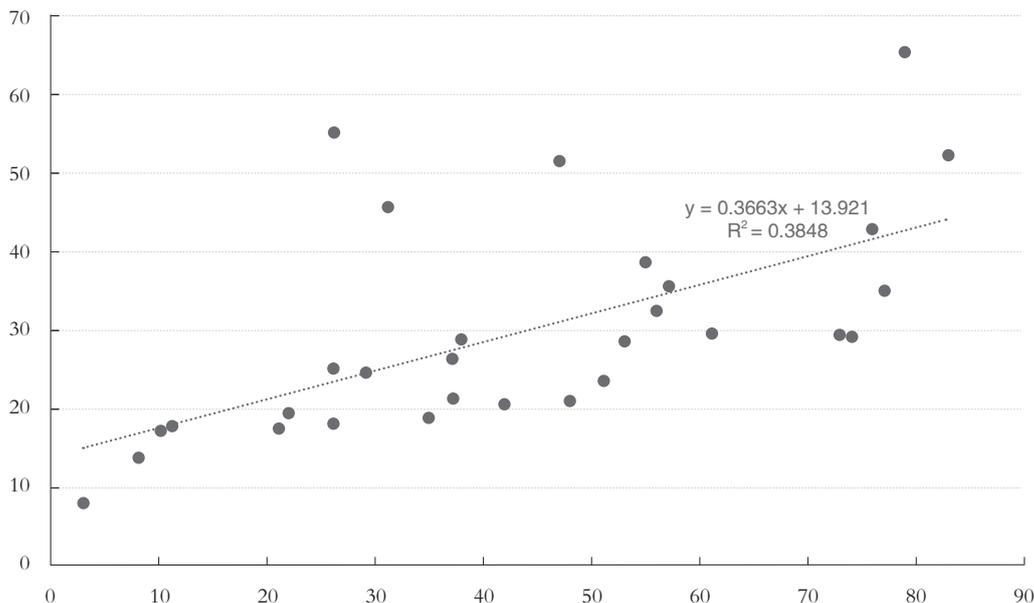


图 2 2020 年 31 个省（市）的高职院校数量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散点图

数据来源：同表1

#### 四、结论和展望

在我国从制造大国升级到制造强国的进程中，职业教育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重要力量。本文研究发现，与普通学历教育相比较，职业教育具有就业优势、机会成本优势、专业调整动态优势以及立德树人、思政教育的优势。基于职业教育的比较优势，职业教育影响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拉动着区域数字经济增长，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职业教育的规模和层次。在定量分析中，从2020年截面数据来看，中国省（市）高职院校数量与其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正相关，高职院校数量多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也位居前列；高职院校数量少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也较为

靠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优化分配结构，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双循环顺畅联通的重要因素。职业教育是提高劳动者技能，实现高质量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途径。职业教育对于缩小贫富差距，释放内需活力具有重要引导作用。未来，职业教育应主动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要求，进一步巩固和突出职业教育的比较优势，坚持将立德树人融入职业教育教学和实践环节中，紧贴社会需求，建立健全专业目录动态更新机制，对接新经济、新业态、新技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强有力的教育支撑。

## 参考文献:

- [1] 孙涛.高等教育扶贫:比较优势、政策支持与扩展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20(2):137-140.
- [2] 岑晓潼.东盟留学生缘何来桂——基于东盟在桂留学生留学动因的实证分析[J].高教论坛,2020(2):87-88.
- [3] 李兴洲,赵陶然.职业教育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建设的比较优势探析[J].中国教育发展与减贫研究,2019(1):62-64.
- [4] 姚永强,何丽芬.从外生比较优势到内生比较优势:我国重点大学“双一流”建设路径的思考[J].现代教育科学,2019(6):1-5.
- [5] 张优智,张珍珍.教育投入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9):9-16.
- [6] 孟望生,徐进.财政教育投入的经济增长外溢性实证检验[J].统计与决策,2020(36):129-133.
- [7] 祝树金,魏娟.开放条件下的教育支出、教育溢出与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2008(5):56-59.
- [8] 叶茂林,郑晓齐,王斌.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1):89-92.
- [9] 李艺铭,安晖.数字经济:新时代 再启航[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105-110.
- [10] 张腾,蒋伏心.数字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J].经济问题探索,2022(05):4-16.
- [11] 白雪洁,宋培,李琳.数字经济发展助推产业结构转型[J].上海经济研究,2022(5):77-90.
- [12] 张青山.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考[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11):59-63.
- [13] 徐铭,丁钢.高职院校文化传承创新的自觉路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2(21):72-75.
- [14] 白滨,和震,吴秋晨.高技能人才职业核心素养——一项企业雇主与优秀员工视角下的质性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18):15-24.
- [15] 马吉宏.论高职院校文化传承创新的主体自觉[J].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学报,2019(4):102-105.
- [16] 郭璇瑄,陶红.数字经济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65-74.
- [17] 刘琛.数字经济背景下的职业教育[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0(34):40-49.

##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China

WANG Jia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 China)

**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orker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t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make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digital economy.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the advantages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st, dynamic professional adjustment, moral education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ffects the soft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drives the growth of digit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has an impact on the scale and lev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2020, the number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a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digital economy scale of the province (city). At this stage, we should further expand the scale of student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provide strong educational support for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and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double circulation.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责任编辑:何耀琴)